

异，可以对比不同活动事务的组织经费支出，从而了解地方党组织经费的多重面相。而不同类别的文件之间也可以通过对比进行解读。在表格中，党组织经费状况常以统计形式呈现，便于后世研究者了解收支项目类别的全貌，对哪些项目支出较多、什么时段开销增大等问题产生一种整体认识。而在报告中，报告者往往对经费的叙述有不同的侧重，增添了统计之外的其他信息。将二者进行对比，有助于从多方面深入了解相关问题。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是比较结果上升为研究问题的重要环节。例如，通过对比各级党组织同类经费收支，可以发现何种现象；通过对比历年“五一”节的省委宣传大纲，可以发现哪些趋势；等等。由此来看，“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海量文件的确可以生成丰富的研究问题。

二是注意运用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收录的文件相互参照补充。各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文件数量和详略有所不同。因此，如果局限于一省的文件运用，就很容易削弱分析的深度。由于处于相同的政策环境和组织制度之中，各地党组织的基本运作原则大体相同，故而一地的事务处理情况，往往可以参照其他地方的事务材料进行分析。例如，各省关于党员调动的规章文件较为罕见，只有《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一份1930年的党员工作调动条例，详细说明了党员调动的手续流程^①。那么在分析其他省份的党员调动案例时，就可以参照这份规章进行推导，从而剖析研究案例的运作特征与各方互动。同样，在该套史料集中，文件的连贯性也难以保障，有的事务缺乏前文交代，有的事务没有后续下文。通过运用各省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案例进行对比，往往可以相互补充残缺模糊的部分。

三是应留意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收录文件之间的联系。这套史料集是依据中共地方组织体系进行编排，但在现实中，许多革命活动跨越了组织机关之间的管理界限，与多个地区的组织机关产生联系。因此，后世研究者很容易发现一些革命活动的相关文件出现在多个省份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如果仅仅关注一省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就只能了解到这些革命活动的局部情况而难以窥见其全貌。例如，1929年，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在赣闽粤三省来回转战。这个时期关于朱毛红军的记载，就分散于江西、福建与广东三省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而各地党组织关于朱毛红军的报告也详略不一，判断各异。因此，需要将三者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分析，才能了解朱毛红军活动对各地党组织的复杂影响。

当然，除了“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内部文件之间的交互使用，与其他类型史料之间的交互使用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包含许多共产国际对中共组织运作的内部分析，与其相互参照更有裨益。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体用之间：“改革开放政策史”视野下的史料学问题*

赵 诺

改革开放史将成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增长点，近年来似已成为学界共识^②。既然

① 《江苏省委关于党组织工作条例——党员工作调动条例、介绍编组条例、党员转党条例》（1930年3月20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1985年印行，第610—611页。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北京大学收藏思想政治理论课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22VVSZ087）的阶段性成果。

② 需要承认的是，改革开放史研究著述的数量、质量虽有所增益，但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有分量的规模研究依旧极为稀缺。

是“增长点”，那么就意味着此论域尚处于起步或未成熟阶段。大体而言，一个新兴史学领域的崛起或者说对某一时代历史的最初发覆，一般首先仰赖史料特别是一手史料的挖掘和利用。同时，史实重建、框架形成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学术视角、理论关怀的嬗变。重点挖掘什么新史料、能否激活旧史料、搜集到各种史料又如何利用等一系列基础问题，都要求研究者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敏锐性，这也就是议题选择的方向感。就今日史学而言，学术研究的可行性、操作性，往往建基于史料与议题的结合或配合，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①。改革开放史研究尤其如此：一方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距今不过40余年，各种资料实际留存丰富；另一方面，档案开放程度有限、专业化史料整理缺乏，造成周边史料膨胀、核心史料不足的突出问题，很多研究者面对汗牛充栋的资料却无从下手。在这种条件下，仅仅凭借常识理性进行简单分类，无重点、无取舍地找资料，必然事倍功半、无所依归。因此，要实现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实质性突破，格外需要通过议题选择来找到史料挖掘利用的着力方向。基于此，笔者不拟单纯就相关史料进行罗列式介绍，而是根据相关史料的总体特点，运用问题导向的方式，着力探讨如何依靠视野拓宽、议题增容等进一步挖掘和利用史料，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依此思路，本文自然也不准备将涉及政治外交、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层面史料泛泛通讲一遍，而希望首先循着“改革开放政策史”的进路，在实操层面谈谈改革开放史的史料学问题。

一、作为史料与议题交汇点的“改革开放政策史”

选择“改革开放政策史”这个议题方向，不仅仅因为在实操层面探讨史料学问题需要一个立足点，更因为在笔者看来，政策史恰恰构成改革开放史研究在起步阶段里史料与议题的一个交汇点。

由字面理解，“改革开放”是一个蕴蓄强烈政治意涵和政策方向的词汇。分开来看，“改革”和“开放”都属于通常所说的政治领域的“方针政策”范畴。党史研究者固然不能简单认为改革开放只是一个政治进程，但政治变迁仍然是决定改革开放发端、发展及后续走向的第一因素。是故，改革开放史的撰述、研究和教学工作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常常被强调具有“资政育人”的关键特性。

与此相应，尽管改革开放史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但自20世纪末以来，以政治史研究为先导，在改革开放史的一些细分领域业已形成一定风格，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政策史，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改革开放史研究自身定位和学科成长背景有关。应该说，诞生于改革开放实践跨步前行的进行时态中，这个研究领域问世伊始即以“问政”与“对策”为基本取向。萧冬连是最早一批涉预其间的改革开放史学者，他对自己学缘的追忆便是一个很好的诠释：“从1980年代开始，我就关注改革开放进程，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当时改革开放才开始，没有‘史’的概念，只是对现实问题感兴趣。没想到，这一持续的跟踪和积累，为我的研究确定了方向。”^②

从议题的理论意义来看，政策史研究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时代精神高度契合。一般认为，政策是政治生活中理论与实践的“联结器”或“中介”，任何政治理论无论高明与否，欲有效指导实践，均需借助政策的力量。政策并不是抽象的对于规律的阐释，更多的是一种关于政治活动、治理行为的规范，是对政治、经济资源进行再分配的抓手，必须以解决问题为根本诉求。自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之日起，如何将其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应用到本国革命的实际中去，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母题”。恩格斯曾倡言：“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③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国家，无论姓资姓社，都很重视政策，但极少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将政策的重要性提得这么高、强调得那么多。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制定、实施正确的政策，进而解决问题、克服疑难，是决定中国革命、

① 邓小平：《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第506页。

② 萧冬连：《谈谈我的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江淮文史》2023年第4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页。

建设、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一段时间里，政策的重要性大大让位于领袖个人意志，但改革开放以来，政策作为一个政治运作的核心环节被空前重视起来。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强调政策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一个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堪称“政策的时代”。所以，政策史研究在议题设置层面具有较强的通贯性和综合性特点，有利于研究者把握改革开放史的主流、主轴和主线。

更重要的是，依托于政策在改革开放史料中的“基线”意义，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突出政策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换言之，政策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是由政策在改革实践中的实际作用所决定的。笔者阅读一批相关史料后的直观感受是，反复强调政策这一组织行为的作用、威力而不再片面突出最高指示、主席语录，是改革开放以后领导干部讲话、发言、汇报的一大共性特点。1980年7月23日，邓小平在郑州听取河南省领导班子汇报时即表示：“农村要发展，要注意两点，一是政策要正确。政策威力大，有了正确的农村政策，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①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将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原因，概括为内外两个条件、两项政策：“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②习仲勋曾在给中央的一个建议中谈道：“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坚持在改革、开放中解决，努力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充分发挥政策威力。”^③在1984年5月4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里，党中央、国务院更是向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郑重表态：“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钱，主要是给政策。”^④

但是，作为议题与史料交汇点的政策史研究，时下并不为学界所看好。以往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笼统涉及政策史议题者其实不少，但深入、翔实的研究则很缺乏。大多相关著述使用的史料较为稀薄、单一，内容基本在“会议—文件”“政策—执行”的框框里打转，这类政策演变史被认为容易“陷入文山会海和领导人思想观点的简单再叙述”^⑤，给人以枯燥、浮泛之感。于是乎，改革开放史研究近年虽有进展，但包括政策史在内的政治史研究比重已有所下降，视点似已向社会经济、大众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转移，这种情况对基本框架尚在构建中的改革开放史并非利好信号。

基于此，笔者拟以论理和举例相结合的方式，努力论证沿着“改革开放政策史”进路如何打开议题论域空间、找到史料搜集方向，进而实现史料与议题的相互配合与促动。

二、延伸拓展——激活“基础史料”

尽管改革开放史研究领域目前尚缺乏公认的必读史料，但已积累了一大批关涉重要议题的“基础史料”，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党史和文献工作部门及相关机构编撰的领导人著作（包括一些单行本论述摘编）、传记、年谱、回忆录等；二是部分重要文件集和资料集；三是报刊资料。

然而，受制于一手过程性史料特别是核心档案史料不足的问题，研究者仅仅依托这三类史料，以传统事件史方式集中讨论中央层面的政治运作和决策过程等还很困难。这不仅仅导致相关研究缺乏实质性推进，更导致与政治问题贴近的基础史料总体处于闲置状态。面对此状况，相关研究者或可在以往政策史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拉长研究的时间断限，向前后时段延伸，把政策演变置放于更长时段的历史脉络里，进而把握前后定策过程中的衔接与断裂问题，形成对重大“政策链条”的完整理解；另一方面拓宽研究视野，关注同一时期相互匹配、相互平衡的“政策群”，毕竟改革政策的出台常常不是一项孤立的内容，往往以“一组政策”的形式问世，只有把握政策间的关系、关联，才能形成对“政策网络”的全面理解。循此路径，研究者或许能避开依靠基础史料具体考证高层政务活动细节的难处，在更广阔的论题空间里充分利用基础史料并极力发挥其史学价值，这有助于改变过去政策演变史被人诟病的“政策—执行”线性叙事模式。

① 《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6页。

③ 《习仲勋文集》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1157页。

④ 《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19页。

⑤ 郑有贵：《改革开放史研究要有实践问题导向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

至于如何找到基础史料并实现有效利用，此处试举一例加以说明。比如，当研究者考虑备受关注的价格改革问题，在高层档案不易查阅的情况下有哪些史料可供利用？

依前文所说三类材料之划分标准，第一类即与领导人相关的已刊文献。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胡耀邦、万里、姚依林、宋平、习仲勋、王震、余秋里、宋任穷、乌兰夫、王任重、胡乔木、谷牧、方毅、康世恩、袁宝华、薛暮桥等人的有关历史资料，均从不同角度或多或少涉及价格改革或物价问题。其中，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姚依林、康世恩、袁宝华、薛暮桥等人的资料尤多一些。

第二类文件集和资料集实际分为三种。首先是最常见的由党史和文献工作部门编纂的综合性文件汇编，如《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等，这类文件集、资料集在很多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里均有收藏。其次是中央和地方物价部门编纂的专业性文件集和资料集，如国家统计局城市抽样调查总队编《物价统计文件汇编（1978—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编《物价文件选编（1979—1983）》（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国家物价局轻工产品价格司编《小商品价格文件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商业局物价处编《湖北商业物价文件汇编》（1979年印行）等。这些文件集、资料集一部分藏于高校图书馆，有一些在地方发改委、物价和商务部门的资料室里能找到，还有个别的在旧书交易网站、旧书市场有售。再次，少数领导干部及学者个人编辑的资料集具有较高价值，如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编撰的《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年）》，名为“纪事”实则资料汇编。在该书选编的领导人讲话、会议记录中，有不少内容涉及价格改革政策的顶层设计问题。这套书籍过去有部分研究者使用过，部分科研院所和高校图书馆里也有收藏。

第三类报刊资料也分两种。第一种是关注价格改革相关问题的财经类报刊，如《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价格理论与实践》《价格月刊》《经济研究》《计划经济研究》《财贸战线》《市场》《中国财贸报》《中国农民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参考》等。在这些报刊中，除了相关新闻报道外，还有不少供当时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参考的内部讲话、理论文章、调研资料、经验分享等。譬如，由中国价格协会主办的价格专业学术期刊《价格理论与实践》即有大量关于价格改革方面的珍贵资料，该刊编辑部还组织编写了《物价大事记（1978年12月—1985年）》，直接摘编了不少一手史料。第二种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常见报刊。由于物价是民众十分关心的话题，所以从各级党报党刊到晨报晚报，均能看到异常丰富的物价资料，其中既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商品价格讯息，也有物价政策及相应解读文章，甚至还有大量以记者采访、群众来信等形式登载的社情民意。这些自下而上对价格政策的社会反馈，虽已经过记者、编辑的整合、加工，但还是保留了大量鲜活而犀利的真实内容。目前，改革开放后生成的报刊资料一般被视为“易见史料”^①，因为除了各种电子数据库里的报刊资料，各级各类图书馆也都藏有大量报刊，研究者只要愿意费些脚力就能“按图索骥”。前文提到的专业性刊物在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图书馆均有收藏，少量不好找的报刊则可求助地方政府财经口的干部或通过民间渠道购买、复制。

说到底，以上三类史料只需略微“动手动脚”就能看得到，惜乎过去并未得到党史学界的真正挖掘和利用。而综合这些史料，拉长、拓宽考察视域，朝向“政策链条”“政策网络”展开深入研究，完全可以更好地建构起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改革方针政策的酝酿、出台、落实、反馈、修正、再反馈、推广的整体过程。

这种治学思路与政策史研究本身通贯性较强的特点相契合。所谓通贯性，即侧重于探讨各种政治合力构造的政策脉络，而不以特定事件或人物活动为考察的着眼点。由此来看，价格改革相关研究的瓶颈就在“脉络”问题上。大体而言，价格改革这个过去已受到较多关注的历史议题，其实长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价格闯关前后领导层孰是孰非的层面上打转，各种相关著述的讨论高度

^① 吴志军：《从易见史料的多元化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实证性》，《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重复；由于对前因后果不甚了了，部分经济学研究者似乎也只能给出一个宽泛的理论框架，既未触及深层的政策逻辑，也未回答中国的价格改革到底有何特点。目前的一些粗略叙事，给读者的感觉是价格改革所使用的政策工具与东欧的改革似无本质区别，且在价格闯关问题上一度遭遇挫败。因此，很多人至今说不清到底物价改革与前期的经济调整是什么关系、物价政策的实际社会影响如何、价格改革和稳定物价之间的矛盾是怎样加剧又如何化解的、价格闯关不利后的相应政策调适如何展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根据笔者前期的阅读、整理，依托这批基础史料，完全可以将视点上探至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调整过程中的价格政策问题，下探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应对通货膨胀的价格政策问题，如此就能看到在从价格调整到价格闯关再到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十几年间的价格改革政策链条有一条隐线即一个所谓的“三角平衡”问题——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保证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三者的动态平衡，但其中的平衡略略向前两个方向倾斜，即中央首先要保证的是物价稳定和社会稳定。与此同时，“政策网络”的视角还能够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如果关注1979年到1981年间的价格改革，可以看到中央一开始推出的就是整顿消费品原材料价格、修订服务性收费标准、恢复集市贸易和三类农副产品议购议销、给予企业一定自销权和定价权等一揽子政策，这些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出现较多相互抵牾之处，引发通货膨胀，导致中央重新祭出“冻结物价”“上收权力”“抑制非国有企业”等政策，譬如关停计划外烟厂、逐步建立烟草专卖制度等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但是，“冻结物价”之类的政策与同一时期其他改革政策的大方向并不契合，所以“冻结”政策随后适时退出了。由此来看，当研究者把纵向的政策链条联系起来时，就更容易看出这一时期改革背后的政治逻辑。

概言之，通过延伸和拓展研究视域，以“政策链条”“政策网络”的视角围绕大小政策来龙去脉作出更翔实、深入的梳理，将大幅度激活基础史料，从而对各种历史和理论问题作出新的、实质性的回应。

三、纵向下沉——厚积地方档案

上文谈及史料状况制约了改革开放时期高层决策过程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忽视“政治过程”“政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其实，研究者适当将视点偏移，就会发觉眼前一片开阔。如果在研究思路上稍稍“下沉”，即会发现海量地方史料可供使用^①。譬如，与三类基础史料相对应，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出版过很多个人传记、回忆录、文集，地方报刊自然也存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而地方党史、方志、档案等部门编纂的各种资料集既有大量中央各种文件的传达稿，也有各种政策在地方落实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报告、讲话稿、会议纪要等珍贵资料。此外，各级地方档案馆已经开放了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部分档案，其中涉及政策史的档案数量最巨。因此，在切实掌握全局性资料的前提下，把研究的聚光灯打到地方场域，规模利用以原始档案为代表的地方性一手史料展开实证研究，则会看到国家、政权的方针政策与社会真正碰触后的“政治开拓面”，从而将历史的纵深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当然，这种围绕“地方决策”“政策联动”过程的研究与一般地方史虽有关联，但并不是单点式的，而是特别强调多层次、辐射型的研究进路。

同样举例来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特别是确立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大事，相关研究算是改革开放史领域最丰硕、成熟的，不少先行研究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逻辑也作出了较好解释，勾勒出了包产到户从出现到成为国家政策导向，最终推向全国范围的基本脉络。但如果从地方决策、政策联动的角度看，这一历史问题依然

^① 近年来，地方档案馆依照相关法律和政策，向社会公众开放大批档案，目前一些档案馆里可查阅、抄录的开放档案时间下限已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限于种种原因，各地档案馆在档案开放方面的具体政策掌握尺度差异很大，给研究者查档带来很多不便，笔者也屡屡碰壁。但根据笔者和部分同学的前期经验，只要肯下功夫一家一家档案馆跑，每次均能遇到部分开放情况较好的档案馆，而一旦能依法依规查阅、复制、抄录，从每家档案馆所搜集到的档案资料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笔者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阅读、整理这些数量巨大的档案资料，说明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更多团队合作。

存在诸多可发覆之处。大体而言，在目前的农村改革史叙事中，相关研究高度集中于安徽等个别改革先导区，一些研究者虽力图在人事往还、政策交互上加以追问，但对基本线索的解释仍大体停留于“个别突破——中央认可——全面跟进”的一般性框架。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但不够有层次感，因为并没有讲清楚改革起步期各省政策的异同及其背后的政治考量，以及中央从差异化的地方经验中到底看到了什么进而做出选择等等一系列问题。学界虽宽泛认同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经验是分省决策”^①，但省级决策的相关研究极为稀缺。如果把农村改革的政策走向问题仅仅浓缩为领导干部是否支持包产到户并以“改革”“保守”划线，那么就窄化了农村改革史研究的视野，无法很好地解释政策推开后“三农”问题背后的因缘。

笔者先前曾尝试对山东省的情况进行具体考察。省内各级档案馆虽开放状况不一，但还是能提供可查阅的海量档案，其中能帮助研究者了解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局部决策过程的史料数量非常可观，譬如省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记录、部分市县的地方党委常委会记录、各级党委政府干部会议纪要、地方各级领导人讲话稿及对政策互动有详细记述的工作汇报材料等。同时，在地方档案馆所藏中央文件的传达稿中，亦有相当数量的会议纪要和领导人讲话传达稿，再加上中央、省等相关机关编辑的各种内部刊物^②、资料集及部分地方干部个人史料（如日记、工作笔记等），研究者实际上就能掌握足够体量的一手史料。从这些史料的类型、内容来看，以省、地（市）两级为视点考察地方决策过程、中央地方政策往还以及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等问题是相对合适且有效的^③。

在此期间，笔者有一个最大的感受：研究改革开放以后的地方决策、政策联动等问题，要特别注意史料的多层次、多元化，这不仅决定着研究的高度和上限，而且直接影响研究是否能够跨过门槛。因为在农村改革的复杂过程中，对于是否要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等问题，中央在很长时间里给出的政策信号并不那么积极，地方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回应和表态差异也很大，如果只抓住部分材料加以整理、组合，常常会让研究者直接得出错误判断。例如，如果只看各级领导人场面上的讲话、一些地方上的“经验通报”和类似《大众日报》等党报上的文章（这些材料体量也不小），研究者就很容易判定从山东省委到县委的干部在农村改革问题上普遍采取消极态度，只有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等个别干部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改革先驱，然后印证既往一些著述里“改革/保守”二分法式的理论框框。但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领导人对山东在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上曾多次给予肯定，县乡生成的各种调查材料呈现多种生产责任制形式“竞相争艳”局面，周振兴等人也很快就得到提拔重用。那么，即便研究者看不到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记录和部分领导干部日记，也得通过一些会议纪要、汇报材料、内刊文章等材料，才能发现山东省委领导层一方面在推动包产到户问题上采取持重态度，党报党刊常常对中央的一些说法采取拿来主义式的搬运腾挪，在相关争论中态度谨慎，并不过多涉入；另一方面则以落实生产责任制为名义，对周振兴等人给予提拔重用，允许各地市依据各自经济发展水平选择不同形式责任制，避开包产到户的争议，鼓励各地在具体提质增效方面向纵深处发展，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上取得较多实效。^④

继续围绕农村改革的政策联动议题扩大史料和讨论的范围，研究者就能进一步看到，除安徽省外，各省份放开包产到户的进程大致分三个批次。第一波是贵州、甘肃、云南、山东、河南、辽宁、内蒙古、宁夏等省区；第二波是湖北、江西、河北、山西、广东、福建、湖南、吉林、浙江等省；第三波则为江苏、黑龙江等省及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如果继续追索，则会发现各省放开包

-
- ①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下）——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管理世界》1995年第4期。
 - ② 目前可以看到的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办的《情况反映》、新华社办的《内部参考》、农业部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山东省委办的《情况交流》等十余种。
 - ③ 这既不是否认县级以下党政机关的政策裁量权，也不是否定以县或更小地域范围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而是因为如以县、乡为研究视点或范围，往往至多是对地（市）县两级政策互动做些实质性讨论，中央、省级都基本作为一个政策背景做些介绍，这很难有效顾及改革开放初期很突出的“分省决策”特点，不利于研究者把握历史问题的关键所在。
 - ④ 赵诺、刘照峰：《改革开放初期山东省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历程》，《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4期。

产到户的时间和推行包产到户的进程之间存在一定的错落关系，即部分省区放开包产到户虽晚一点，但转向后在推广问题上力度大、速度快。例如，第二波放开省份中的山西是“农业学大寨”“大寨经验”的发源地，农村改革起步节奏较慢，曾受到中央批评，但在省委领导层改组后，很快就全面推开包产到户。根据前期史料搜求经验来看，尽管多数省级档案馆开放程度有限，但不少市、县级档案馆已依规开放部分农村改革相关档案。

责任制改革相关的政策变迁及其落实，也是一个全局性、多层次的问题。过去不少史述更多关注乡村改革，对城市企业改革相关细节的观照偏少，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亦即1984年之前的城市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的作为非常有限。实际上，只要沿此思路搜集责任制改革相关地方档案，就不难看到在乡村地区突破“农业学大寨”框框的改革效应带动下，这一时期的城市企业也不再片面突出“政治挂帅”的“工业学大庆”经验，在政策面进行了广泛的企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史料的开拓就是这样带来了议题上的“链式反应”。正是通过阅读黑龙江省农村改革相关档案，笔者注意到在这个“对包产到户不那么积极”的省份里，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地市以很高热情推动了当地工业企业的责任制改革，甚至省市领导在改革中不时以其他省市农村改革政策的效果作为援引，可见“地方决策”“政策联动”过程之微妙。

因此，随着视角延展和地方档案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利用，必将有更多关于责任制改革的独创性研究^①。有研究者担心主要用地方档案从事责任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容易重复建设且造成研究的碎片化。这种忧虑大可不必，因为对积累还十分单薄的改革开放史研究而言，恰恰需要的是先产生几个聚焦式的学术议题。过去相对有较多积累的责任制改革问题，便是其中很有发展潜力和理论涵盖能力的命题。从“地方决策”“政策联动”的角度去看农村、城市改革的发生发展与相互拉动的过程，其实是对“边缘革命”“有为政府”等整体性理论思考的直接回应，在聚焦中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老问题，又在聚焦中引申出更多新议题（譬如前述“三波论”和“错落论”）。

相较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等经济政策变迁方面的相关研究，在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这样的聚焦性议题几乎还处于彻底的“处女地”状态。

四、横向汇通——兼容“周边史料”

诚如上文所论，改革开放史研究领域存在“周边史料膨胀”的现象。这里的“周边史料”，并非指区别于前论各种史料之“另类”史料，而是指那些相对零散且看起来不易集中使用的史料。前文提及的各类史料里均存在大量“周边史料”，且目下能看到的改革开放史料恐怕大多属“周边史料”。但是，“周边史料”并不一定是只起锦上添花作用的“次要史料”，通过准确定位、适当组合，也会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推进发挥关键作用，甚至某些“周边史料”如能得到充分挖掘并与合适议题搭配起来，还可以转化为“核心史料”。那么，顺着“改革开放政策史”的研究取径，又如何找到、用好这些“周边史料”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发挥政策史研究综合性强的优势，同其他研究进路结合起来，形成学术“汇通”。

一个可能的路径是与制度史的汇通。对这一门径的体会，直接源于笔者近期正着手考察的1982年到1988年的机构改革问题。笔者最初的意图是从制度史角度考察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的机构职能，但在搜集、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深感这段时间是一个制度建设的“爆发期”，各种变动堪称日新月异。而关于国务院机构职能中最核心的领导体制问题，细部的一手史料并不充裕，故而执着于描摹、分析制度的规程、形态，恐怕费时费力后却遗漏关节、难以立论。与此同时，在制度建设的爆发期里，各级各部门的职能问题都会涉及多项平行或有一定层次错落的制度，并不以单一形式出现，研究者恐怕只有在“制度丛”里才能更加准确理解和把握制度背后的运思与逻辑。显然，一般的制度史研究很难有效解释当时国务院系统机构职能方面一些有趣或有疑的问题点，而“政策”恰恰是制度间的交错地带与联系纽带。当研究者把切入角度变成讨论这一段时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① 根据笔者之前对北京大学所藏档案和文献的阅读，20世纪80年代的高校责任制改革问题也值得引起党史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时，则能通过政策史的过程性研究，将当时一二线领导体制、书记处与国务院关系、国务院机构设置、国务院议事协调机制、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干部离退休制度、经济管理体制等统一纳入讨论范畴，且根据材料状况分别掌握讨论的深度。

要探讨这些问题，自然需要仰赖前文提到的各种史料。总体上看，机构改革所涉组织人事问题的政策权限一般高度集中，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较低，但因机构改革具有自上而下集中统一的属性，核心文件并不繁复，文件集、资料集的相关收录已占较大比重。在地方档案中，主要值得关注的更多是各种体现政策效果的案例和反馈。是故，结合制度史视角考察机构改革政策问题，应首先搜集各类文件集和资料集，特别是各级党政机关编纂的相关专题、部门性质的文件集，如《组织工作文件选编》（中组部办公厅编印，1985年印行）、《机构、编制、体制文件选编》（劳动人事出版社，1986年）、《交通部机构改革文件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等。此类材料体量实际不小，目力所及已近百部（册），但内容重复稍多。同时，在1982年、1988年两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前后，《情况通报》《内部参考》等内刊零散刊载了一些相关主题的领导人讲话、调研报告，对机构职能、部门关系、编制人事、干部调整和机构改革开展等情况有不少介绍和分析，其中有部分资料可被视为过程性史料。

在此基础上，当研究者持续关注机构改革问题时，会注意到还有一批规模很大、性质特殊的“周边史料”，即各种与机构编制等问题相关的工具书和类书。自20世纪80年代末到世纪之交，出于推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法制化与规范化、提高干部业务能力、对外宣传甚或单位创收等考量，中央和地方党政机构曾编纂大量工具书和类书，卷帙浩繁、名目繁多，甚至常常因互相“借鉴”而看起来缺乏权威性，但实际上这类书籍里保存有大量有关体制机制工作的政策性、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其中所选文件很多是给相关机构干部看的操作规程和工作守则，有些文件专门列举组织人事部门、经办人员在机构改革过程中的各种正反面经验、事例，可补前述文件集、资料集之缺^①。据笔者所见，各级各类图书馆通常藏有很多这种大部头的工具书和类书，平日借阅者寥寥；在各地书市、旧书交易网站上也多有售卖，但往往无人问津。这与当下各种文件集、资料集受到热烈追捧形成鲜明对比。研究者如愿花时间搜集、翻阅，当有意外收获。

此处再简单谈谈政策史与思想文化史、社会心态史的汇通。总体看来，它们之间的汇通可以沿着内外两种方式展开：向内用力追索政策背后的思想资源及决策过程中干部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心理；从外部观察政策对大众心态、社会思潮的影响，即探讨政策的社会反响，这与社会史研究存在一定交集。

如果能让这一取径在研究实践中真正落地，有几类史料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撰写的日记、笔记、书信等。历史研究者通常都高度重视日记等一手史料，但涉及改革开放史的相关材料还缺乏整理，改革进程中关键人物的日记更是异常稀缺。因此，一般干部群众的日记就常常成为零散分布、少有利用的“周边史料”。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干部的日记已经在海内外出版。目前笔者已读过辽宁省政协原主席孙奇、甘肃省委原常委韩正卿、山西省左权县“乡土学者”宋树元等人的日记20余部^②；而散落在民间的海量日记、笔记手稿尚待研究者挖掘；至于体量更大的个人书信，相关的整理出版工作很少，需要研究者在民间寻觅。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主办的报刊，其间也有大量反映社情民意的新闻报道、访谈资料和读者来信，内容异常丰富、细腻，其中《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尤其值得关注。同时，党政机关（主要是中央、省级）所办内部刊物中有大量反映干部群众思想心态的调查报告，内容普遍深入

① 如劳动人事部编制局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机构概要（1987）》，中国工人出版社，1988年；夏骥等主编：《机构编制管理手册》，中国人事出版社，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央编委办公室综合司编：《中央政府组织机构》，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宋涛主编：《最新办公室内部管理规定制度全书》，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等等。

② 参见《孙奇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韩正卿日记》（定西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宋树元日记》，2023年印行；等等。

而犀利。另外，在地方档案馆所藏群众来信及来访记录的内容中，也有大量反映政策效果、社会心理的重要史料，一些档案馆已把部分来信和来访记录划入开放档案范围，研究者可以尝试查阅。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和民间摄录的海量影像、音频资料，特别是新闻资料片、纪录片、电视片里有大量围绕政策落实情况对一般干部群众的采访，虽有部分是专门安排的组织行为，但其中依然有很多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根据笔者前期读报刊、看视频的直观感受，这两类媒介所呈现的社情民意当然有共性，但也有一定差异。四是以新诗为代表的各种文学作品里也有大量对改革开放年代政治、经济现实的描摹、感怀及隐喻，这也是一种针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思想“回音”。笔者近期不仅阅读了一些朦胧诗，而且阅读了部分普通干部群众写的“打油诗”，深感“以诗证史”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同样适用。

梁启超曾言：“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则愈难。”^①尚在起步阶段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所面对的史料体量规模和复杂程度均超以往。若欲为此新兴研究领域奠定基础，须根据此时代相关史料特点在史料学上做好准备。具体怎么准备？就是要将史料与议题加以统筹，通过议题选择和取舍来找到史料挖掘的方向感。而政策史既在理论上有利于研究者把握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主流，也是史料丛林中实实在在的“基线”。是故，本文主张循着“改革开放政策史”研究进路，坚持问题先导、温故知新的原则，从三方面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史料工作：一是延伸研究断限，从“政策链条”“政策网络”的角度审视政策变迁，激活“基础史料”；二是适当下移视点，关注“地方决策”“政策联动”问题，大量积累地方原始档案；三是横向与其他研究取径建立议题的联结点，将“政策史”与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加以汇通，充分兼容各家“周边史料”。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政策史”的视野下，研究者可以看到议题的导引可能激活各种存量史料，史料的开拓又繁育出新的话题。所以，议题与史料孰为体、孰为用的纠结实际意义不大，二者不是两端对持、简单合作的关系，常常是相互浸润、互为体用的。因此，要真正实现史料与议题的相辅相成，将理论与实践两条历史脉络真正融汇，探寻治国理政的历史逻辑，恐怕关键一着便在于度量、把握这“体”“用”之间的奥妙。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聘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志军）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8页。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4年第6期要目

- | | |
|--------------------------------------|--------------------------------------|
|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主题主线话语表达的历史
演进（宋学勤 张天睿） | 国共北平和谈前后南北通航问题考察（薛克胜） |
| 中国共产党对党支部的早期认识（黄志高）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
演变（沈传亮 吴佳佳） |
| 早期广东团组织内部训练研究（1920—1926）
（贾凯 殷娅娴） | 联动视域下的中共建党史研究（1917—1927）
（王才友） |
| 苏联初级军事院校培养中共军事干部研究
（叶帆） | 二〇二三年党史国史研究若干进展
（满永岳 伟辛逸） |
| “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纪念观研究
（秦勤） | 《党史研究与教学》创刊45周年座谈会综述
（魏少辉） |